

老虎山遗址陶器分期^{*}

李伊萍 赵李博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老虎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永兴乡北部的老虎山南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2~1986年对老虎山遗址进行了发掘, 1986年就前期的发掘成果发表过一次简报^[1], 2000年正式出版遗址的发掘报告^[2]。老虎山文化即得名于此遗址。

有关老虎山文化的文化内涵和分布范围, 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田广金认为老虎山文化成群分布于以岱海为中心的乌兰察布盟南部、鄂尔多斯东部及黄河两侧、包头地区和鄂尔多斯西南部地区^[3]; 魏坚和崔璇则主张老虎山文化应仅限于岱海之滨的老虎山等遗址的同类遗存^[4]; 韩建业通过对整个“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文化面貌的分析, 提出以老虎山文化包含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陕北和冀西北在内的大部分龙山时代遗存^[5]; 孙周勇则将老虎山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即岱海地区以老虎山、园子沟等遗址为代表的老虎山期以及鄂尔多斯地区分别以永兴店和白草塔遗址为代表的永兴店期和白草塔期^[6]。存在上述不同意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对考古学文化命名标准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分歧。此外, 对老虎山文化典型陶器构成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别则是另一原因。

作为老虎山文化命名的老虎山遗址, 其在老虎山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应该是讨论老虎山文化诸问题的一个基础。但目前来看, 学术界对老虎山遗址的研究还很充分。其首要问题, 就是老虎山遗址陶器的分期尚未真正解决。以往涉及对老虎山遗址分期的研究不在少数, 除老虎山遗址的发掘简报和发掘报告之外, 张忠培^[7]、田广金^[8]、韩建业^[9]、孙周勇^[10]、杨杰^[11]等学者对此亦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各家的分期结果也多有不同, 不仅表现在对某些单位期别归属的划分上, 也表现在对陶器期别特征的把握上。导致分期结果不一的原因之一是依据的资料有所不同, 上述研究中年代最早的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 所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 仅仅是简报所报道出来的那一部分, 自然难以做到对陶器的全面认识, 对老虎山陶器的演变特征也就叙述得比较粗略。而老虎山遗址的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虽对陶器的分期结果和演变特征介绍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13年重大项目“龙山时代晋陕高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中期成果, 项目批准号13JJD780004。

得较为详细,但这个分期却并未与遗址的层位关系相联系,其典型陶器的演变缺乏层位关系的支持,期段划分也显粗放。因此,笔者拟从老虎山遗址层位关系与陶器组合分析入手,讨论老虎山遗址陶器的演变过程,建立起该遗址陶器分期框架,通过对其陶器演变序列的详细论述,以期对老虎山遗址陶器的阶段变化和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明确老虎山文化的内涵。

老虎山遗址实际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有7个发掘区(其中Ⅶ区未见有陶器发表),发掘区之外还有许多“清理”(未布方发掘)的遗迹单位。据《报告》介绍,遗址各区各探方的文化堆积并不相同,一般为3~5层不等。文化堆积也比较单纯,出有陶器的地层和遗迹单位共有134个(含“清理”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老虎山文化范畴。虽然《报告》也提到了“从土质、土色和包含物来看,各探方、各发掘区还是可以大致相互对应的”,但又强调“由于各发掘区互不连属,又是多年分别进行,这种对应就不是十分严格”。从《报告》的描述看,并不能确定遗址各区之间的地层是否可以对应,因此判定各区地层堆积的相互关系,最好的证据还是各个地层包含的遗物。这样的话,就不能直接将这几个发掘区的所有层位都当做互相对应的处理,但同一发掘区内各探方之间的层位对应应无大碍。至于“清理”的遗迹单位,《报告》虽然介绍了部分单位的开口层位,但由于对其地层堆积状况并不清楚,因而也不能将之与发掘区内的层位相互对应,而需要用类型学排比来对其年代早晚进行分析。

现依据各区的层位叠压关系,制成表一。

表一 老虎山遗址 I~Ⅵ发掘区中出有陶器的单位的层位关系

发掘区 所在层位	I 区	II 区	III 区	IV 区	V 区	VI 区
1层下						H29
2层	T104②、 T105②、 T106②、 T107②	T201②、 T203②、 T204②、 T206②、 T208②、 T209②、 T210②	T302②、 T303②、 T304②、 T305②、 T306②、 T308②	T403②、 T404②	T503②、 T504②、 T508②、 T510②	T602②、 T609②、 T613②、 T616②、 T617②、 T618②、 T621②、 T624②
2层下	F2	F3、F4	F11		H9、F52 (F52是否打破第 3层情况不明)	H20、 H27、 F59、 F61、F62

续表

发掘区 所在层位	I 区	II 区	III 区	IV 区	V 区	VI 区
3层	T102③、 T103③、 T104③、 T106③、 T107③	T203③、 T204③、 T205③、 T207③、 T208③、 T209③、 T210③	T301③、 T302③、 T303③、 T304③、 T305③、 T306③、 T310③	T403③	T502③、 T506③、 T507③、 T508③、 T509③、 T510③、 T511③、 T512③	T604③、 T610③、 T621③
3层下		H5、 F6、 F7、 F8 (其中H5为F6房 内窖穴, F7不打 破4层, F8是否 打破4层情况不 明 ^[12])		F41 (不打破 4层)	H12、 H31、 F63、 F64 (其中F64不打 破4层, H12、 H31、F63是否打 破4层情况不明)	
4层	T103④	T203④、 T205④、 T207④、 T208④、 T209④、 T210④	T302④、 T304④、 T305④、 T306④、 T310④	T403④	T505④、 T508④、 T509④、 T510④、 T511④、 T512④、 T513④	T618④、 T621④
4层下				H6	H32 (不打破5层)	
5层				T401⑤	T504⑤	

表一中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单位虽多,但真正具备层位意义并出有可对比的同类陶器的单位却比较少。因此,只能以这些层位关系为出发点,再结合器物形态和组合关系的变化现象对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分析,比较同型器物在不同时段的差异,继而总结出各类器物发展演变的趋势。

经过整理,发现能够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器物有:素面夹砂罐、绳纹罐、篮纹罐、大口尊、大口瓮、斜腹盆、钵等。检选之后可利用的层位关系有5组。

A: I区2层→F2→I区3层

B: II区2层→F3、F4→II区3层→F6→II区4层

C: III区3层→III区4层

D: V区2层→H9、F52→V区3层→F64→V区4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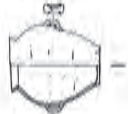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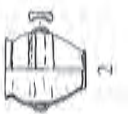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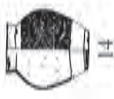
E: VI区3层→VI区4层

根据这几组层位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各单位中不同类型器物的共存关系,对上述典型陶器的演变趋势讨论如下。

开口于II区3层之下的房址F6,出有2件素面夹砂罐F6:2、F6:3(图一,5、3)。其中F6:2为无耳素面夹砂罐,敞口,沿较宽,圆弧腹,最大腹径与口径大致相当;F6:3为带耳素面夹砂罐,敞口,宽沿,上腹微鼓,最大腹径略大于口径。II区2层在层位上晚于F6,出有1件素面夹砂罐T209②:4(图一,4)。其形制特征为侈口,短折沿,最大腹径略靠下,整体较F6:2瘦长。不同层位的这两件器物之间似乎显示这样的演变趋势:口部由外敞变为外折,口沿逐渐变短;最大腹径由略大于口径变为明显大于口径;器身整体变得更为瘦长。按照这样的演变趋势观察其他单位出土的无耳素面夹砂罐,凡可辨别基本形态特征者,并未发现相反的例子。开口于I区2层下的房址F2,出有1件带耳素面夹砂罐F2:4(图一,1),侈口,折沿较短,鼓腹,最大腹径大于与口径,台底,似为F6:3特征的发展。这两件器物的演变趋势同于F6:2→T209②:4(→代表前者向后者演变),也是口沿由外敞变为外折,口沿的长度逐渐变短,最大腹径由约与口径相等逐渐变成大于口径。“清理”房址F49出有1件带耳素面夹砂罐F49:1(图一,2),侈口,折沿,上腹微鼓,中腹较直,下腹弧收,最大腹径稍大于口径,台底不甚明显,特征介于F6:3与F2:4之间。那么,这种带耳素面夹砂罐的演变序列就成了F6:3→F49:1→F2:4。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前面总结的素面夹砂罐的演变序列是可以成立的。

III区4层出土的大口瓮T306④:1(图一,21),方唇,口微敛,肩部下溜,外壁上部拍印横篮纹,下部拍印向左斜的篮纹。叠压于其上的第3层出土1件大口瓮T303③:2(图一,20),比之于T306④:1口部更敛,且肩部向外弧曲,外壁拍斜篮纹,形制上似有发展关系。I区2层下大口瓮F2:2(图一,19)相比较前二者而言,口部内敛更为明显,肩部更为突出,下腹斜收,底部较小,应为前二者的发展型式。

V区4层的大口尊T511④:15(图一,16)具有平折沿、上腹较直的特点。而层位上晚于4层的H9内也出有1件大口尊H9:2(图一,15),其折沿、上腹斜弧内凹的特征与前者应有继承关系。循着这一演变趋势去观察其他大口尊,能够发现出于II区3层的大口尊T208③:2(图一,18)似是“清理”房址F21中的大口尊F21:7(图一,17)

类型 分期	素面夹砂罐	篮纹罐	绳纹罐	大口尊	大口瓮	钵	斜腹盆	敛口瓮		
晚期	 1	 4	 6	 9	 12	 15	 17	 19	 27	
	 2		 7	 10	 13		 18	 20	 22	 25
早期	 3	 5	 8	 11	 14	 16	 21	 23	 26	 28

图一 老虎山遗址典型陶器分期图

1. F2 : 4 2. F49 : 1 3. F6 : 3 4. T209② : 4 5. F6 : 2 6. F27 : 3 7. F17 : 3 8. T513④ : 9 9. F27 : 3 10. T621③ : 12 11. T306④ : 4 12. F27 : 2
13. F52 : 2 14. T621④ : 14 15. H9 : 2 16. T511④ : 15 17. F21 : 7 18. T208③ : 2 19. F2 : 2 20. T303③ : 2 21. T306④ : 1 22. T508③ : 24
23. T510④ : 23 24. F3 : 1 25. T205③ : 6 26. T209④ : 1 27. F29 : 1 28. T510④ : 20

的祖型,只是在体型大小上,后二者区别于前面二者。

V区4层的钵T510④:23(图一,23)口稍敛,折腹位置偏上,折痕不明显。V区3层在层位上晚于4层,出土的钵T508③:24(图一,22),敛口,折腹位置居中,折痕明显。不同层位的这2件钵的演变规律应是口部逐渐内敛;折腹越来越明显且折腹位置下降。

观察各发掘区所出斜腹盆的形态特征,可发现Ⅱ区4层的T209④:1(图一,26)、3层的T205③:6(图一,25)及开口于2层下的F3中的F3:1(图一,24)三者之间除了层位上的早晚关系以外,形态上也还存在着逻辑上的演变关系,即T209④:1腹最深,T205③:6腹稍浅,F3:1腹最浅。其他各区的这类斜腹盆也符合这样的演变趋势,即层位上越早的腹部越深,越晚的则越浅。Ⅵ区4层出有1件斜腹盆T621④:4,可根据斜腹盆从早到晚经历了一个腹壁越来越倾斜、腹深越来越浅的演变趋势来确定其相对年代。T621④:4的腹壁倾斜程度和腹深与T209④:1接近,二者年代应大致同时。前面提到的房址F6及其房内窖穴各出1件大口尊(F6:4、H5:2),《报告》称之为斜腹盆。老虎山遗址中斜腹盆均为夹砂陶,而这两件器物为泥质陶,且其折沿,内、外壁抹压光的特征更像是大口尊,其形制与大口尊T511④:15较为接近,应属与之同时的器物。Ⅲ区4层还有1件钵形豆(T305④:3)的豆盘与V区4层中的钵T511④:38形制比较相似,口稍敛,折腹,内外壁均压光。由此可推测,Ⅱ区4层、Ⅲ区4层、V区4层、Ⅵ区4层、F6这几个单位年代大致同时。

利用上面对各单位相对年代的判断,其他器物的演变趋势也可以一一总结出来。绳纹罐T621④:14(图一,14)出于Ⅵ区4层,其外形特征为侈口,宽沿,溜肩,上腹鼓,下腹斜收。开口于V区2层下的房址F52和“清理”房址F27各出1件T621④:14的同型器,即F52:2和F27:2(图一,13、12)。F52:2,侈口,卷沿,颈部稍长,微折肩,腹部斜弧近直。F27:2,卷沿,短颈,折肩程度较F52:2为甚。Ⅵ区4层与V区4层大致同时,早于V区2层下的F52。据此可判断T621④:14、F52:2和F27:2三者之间存在年代上的早晚关系,其特征演变具有这样的规律:由侈口变为卷沿,颈部不断变短;最大腹径由上腹部上移到肩部,肩部则由溜肩变为微折肩,且折肩程度不断加深。同理可知Ⅲ区4层的T306④:4(图一,11),Ⅵ区3层的T621③:12(图一,10)及“清理”房址F27中的F27:3(图一,9)这三者之间也应具有形制上的演化关系:由直口微侈变为卷沿,口沿不断变短;肩部由溜肩变为圆肩,再到鼓肩,肩部加宽;器身整体变得更为瘦长。

直口篮纹罐T513④:9(图一,8)出于V区4层之中,其特征为大口,鼓肩,下腹部平缓内收,底部稍大。“清理”房址F17和F27各出1件与之同型的器物,即F17:3和F27:3(图一,7、6)。其中F17:3口稍大,鼓肩稍宽,下腹斜弧,底略小;F27:3为小口,广鼓肩,似有下腹斜收,小平底。由前文中F52:2→F27:2来看,F27的年代

应不早于F52。而F52又晚于V区4层，所以F27也应晚于V区4层。如此一来，这三者之间的演变顺序便显而易见了，T513④：9→F17：3→F27：4，经历了一个口径不断变小，口沿不断变短，肩部由窄变宽，底由大变小，器身整体变瘦长的变化过程。

“清理”房址F29中出1件斜腹盆F29：3，据其腹壁的倾斜程度和腹深推断其年代早晚应与T205③：6接近。F29出1件小型的敛口瓮F29：1（图一，27），溜肩，饰竖篮纹。V区4层的敛口瓮T510④：20（图一，28）则鼓肩，饰横篮纹。由前可知，V区4层与Ⅱ区4层大致同时，应早于与Ⅱ区3层年代接近的F29。这样就可认为T510④：20→F29：1的趋势为肩部由溜变鼓，器身似乎不断加长，外壁饰纹由横篮纹变为竖篮纹。

将上述器物的演变关系整理如下。

素面夹砂罐：F6：3→F49：1→F2：4

篮纹罐：T513④：9→F17：3→F27：4

绳纹罐：T621④：14→F52：2→F27：2 T306④：4→T621③：2→F27：3

大口尊：T511④：15→H9：2 T208③：2→F21：7

大口瓮：T306④：1→T303③：2→F2：2

钵：T511④：15→T508③：24

斜腹盆：T209④：1→T205③：6→F3：1

敛口瓮：T510④：20→F29：1

应用类型学研究中的横联法确定上述各类型器物所在单位的相对年代，并根据这种不同年代早晚关系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变化划定陶器分期。

I区3层甬T103③：5与V区3层甬T507③：11，都是尖圆唇，微折腹，器身接单把耳，釜底接袋足，足、腹外侧接茬处略下凹，摸捏明显。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裆部较后者稍窄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总体上的相似程度，二者年代应比较接近。V区3层钵T508③：24与Ⅲ区3层钵T305③：4的特征均为敛口，折腹位置居中，折痕明显，二者年代接近或同时。Ⅱ区3层的斜腹盆T205③：6与I区3层的斜腹盆T102③：2形制一般无二，应是同时器物。因此，可将I区3层、Ⅱ区3层、Ⅲ区3层和V区3层所包含单位均视为年代接近或同时。结合前文对Ⅱ区4层、Ⅲ区4层、V区4层、Ⅵ区4层和F6年代的判断，可将这些器物所在单位分作三段：Ⅱ区4层、Ⅲ区4层、V区4层、Ⅵ区4层所包含的单位和F6为一段；I区3层、Ⅱ区3层、Ⅲ区3层、V区3层所包含的单位和F17、F29、F49为二段；Ⅱ区2层所含单位和F2、F3、F21、F27、H9为三段。绳纹罐F52：2的特征介于二、三段之间。

从整个遗址出土陶器尤其是罐类来看，二、三段之间关联比较紧密：一些卷沿或折沿、鼓肩或广肩作风在二段出现后一直保持到了三段；夹砂罐的台底倾向也始自二段；各类器物变化也比一、二段之间要小。因此可以将之分为早、晚两期，一段为早

期,二、三段为晚期。各段具有明显嬗递关系的陶器见图一。

总结遗址中各类典型陶器的演化趋势可以发现,大型的素面夹砂罐整体不断变长,口沿变短,颈部收束加甚,肩部鼓起,底部变小,有的出现台底。中型和小型素面夹砂罐的变化无规律可言。晚期晚段有1件绳纹罐(Y3:3)其外形与素面夹砂罐一般无二,也在腹部施双拱形耳,只在下腹处拍印绳纹略抹,可能为素面夹砂罐与绳纹罐的结合体。高领罐大多为领部残片,结合同属老虎山文化典型遗址的园子沟遗址来看,这种在老虎山遗址器类标本中比例高达8%的大宗器物的演变特征主要反映在肩腹部,而领部特征似无较大变化。只在晚期时,个别高领罐(T507③:4、F64:10、T403②:8)的沿部出现微折的作风。大型的篮纹罐口径不断变小,口沿变短,肩部加宽,下腹由斜弧变得斜直,底部变小。绳纹罐口部由侈口变卷沿,肩部鼓出加剧,最大径上移,有的出现微折肩或折肩,整体变得更加瘦长。大口瓮有口部饰有附加堆纹和无附加堆纹两型:前一型均为口部残片,难以看出其历时性变化;后一型整体由矮胖变得瘦长,最大径上升,肩部不断鼓出。大口尊口沿由平沿变成折沿,上腹由直变凹。钵的折腹不断加剧,折痕更明显。斜腹盆分有斜直腹和斜弧腹两型:斜直腹型的腹深不断变浅,有的在晚期晚段时出现微折腹;斜弧腹型变化无规律可循。小型的敛口瓮整体拉长,肩部变得下溜,外壁饰纹由横篮纹变为竖篮纹。

除了上述器形变化外,老虎山遗址陶器的期段特征在纹饰方面也有表现:一段有少量方格纹,不见刻划纹;二段方格纹增加,并出现少量刻划纹;三段方格纹最多,刻划纹也变得复杂多样。

此外,在陶器类别方面,二段新出现了甗(T210③:1),三段新出现了双腹盆(H9:19)、曲腹盆(F2:3)和罍式鬲(F27:1)。这或许也反映出老虎山遗址陶器的历时性变化。

整体而言,老虎山遗址陶器两期三段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细节方面,并能明显看出其相互因袭的迹象,这就说明老虎山遗址各期遗存前后相承,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连贯性。

本文主要侧重于对老虎山遗址中各典型器物的形态特征演变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对陶器期段的划分,我们希望这种分期方案对目前看来仍众说不一的老虎山文化的文化内涵和范围等问题的研究能有所助益。

注 释

[1] 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 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及相互影响[A].北方考古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11—125.

- [4] 魏坚, 崔璇.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一辑)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125—143.
- [5] 韩建业. 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6] 孙周勇. 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步研究 [D]. 西安: 西北大学, 2002.
- [7] 张忠培, 关强. “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 [J]. 江汉考古, 1990 (1).
- [8] a. 田广金. 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年代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6 (4).
b. 田广金. 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 [A].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 [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140—160.
- [9] 同注 [5].
- [10] 同注 [6].
- [11] 杨杰. 晋陕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探 [A].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 [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165—185.
- [12] 此处对遗迹单位与地层单位叠压打破关系的判断是结合遗址中各发掘区平、剖面图得出的, 有些离剖面所在位置非常近的单位, 如H29, 也按照剖面图所示情况对其层位关系做推断.

A Periodization on the Pottery of Laohushan Site

Li Yiping Zhao Libo

Laohushan Sit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sites of Laohushan Culture which is named for this site. The diverse discussions relat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Laohushan Culture make it difficult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about this culture. Through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potte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vide the periodization about the pottery of Laohushan Site, so as to be helpful to comprehend the tru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Laohushan Culture.

